

长短集

# 江湖传统的现代演义



◎胡晓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  
部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在国人的语汇中,许多名词没有确切定义,对它的理解往往是与特定场景、状态、甚至特定人物联系在一起想象出来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中的江湖便是。据说江湖的称谓最早是由庄子提出的,在《庄子·大宗师篇》中有“泉涸,鱼双与予处于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之名句。

其实,我们都知道,所谓“人在江湖”中的江湖,是借用江河湖泊那种汹涌澎湃的豪迈、坚毅隐忍的气度以及鱼龙皆可混杂的特点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代指一个极具联想性质的组织形式。由于受武侠小说的影响,一些人总把江湖与“侠骨柔情、义字当头、豪气云天”这些特质联系在一起;而在另一些人的眼中,江湖或许就是黑社会的代名词。无论怎样想象,江湖只能是一种具有局部共识性、且难以直接传递信息的符号。

虽然古龙先生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恩怨的地方就有江湖。但是,有经济利益纠葛的地方也会有江湖。本质上讲,江湖就是一种与现有体制尚未兼容的体制外组织形态,它与体制内的组织一样,存



江湖的活跃,在暴露现实矛盾的同时,也说明政府还有许多工作不到位 资料图

在着明确的等级制和行法法则。比如,武林盟主、帮主、教主、“大哥”便是他的权威中心,而江湖道义则是江湖中人理应恪守的基本准则。从形态上看,按追求目标的性质,至少可以划分为白色江湖、灰色江湖和黑色江湖三个基本类别。所谓黑色江湖特指以对抗现有体制为手段,以政治、经济诉求为基本目的的组织。所谓灰色江湖则是指利用现有体制的空隙,通过擦边球的手段“集结而成”的利益联盟体。与前者不同,白色江湖最初没有或者至少在形式上没有政治、经济的诉求,它的目标在于维护现有体制的存续,通过自身特定的行为法则促使组织内成员去弥补现有体制内维护力量的不足,这类江湖形态往往与民族危难相联系。三类江湖形态并非完全静止的,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比如,水泊梁山在晁盖掌门时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色江湖组织,到宋江掌门时,尽管在形式上仍然是黑色江湖组织,但在本质上却具有了白色江湖的意思。水泊梁山被招安之后,由于宋江个人已经成为体制内成员,因此,水泊梁山实质上已经转化成为白色江湖组织,并在随后代替朝廷征讨辽、征讨方腊。

有学者曾论证,中国江湖大规模的发生,发展是在明代,主要根据是明代人口规模的大幅度增长和大量流民的产生。我认为明代之说是可以成立的,但人口原因却不全面。这是因为,由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白莲教、明教等组织的产生正是顺应了当时人们对于民族独立的祈求。明教统一天下之后,其他江湖组织的余部却并没有完全消解,伴随着在人口规模的膨胀和流民的大规模出现,这些江湖组织还在不断壮大。因此,民族矛盾和经济矛盾的加剧是江湖在明代大规模产生的内因,而人口和流民规模的扩张则是外因。或许有人会疑惑,同样是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为什么在清代江湖规模没有进一步发展呢?事实上,清朝近300年的历史中,“反清复明”的江湖组织从来没有停止过行动,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当数“红花会”、“天地会”等。他们之所以没有进一步发展壮大,关键原因是清政府实施了满汉一家、满人汉化的政策,在清代的大多数时间里,经济发展势头比较好,尤其税负非常低,清政府设立了军机处、书房等机构,对于稳定政治大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买房者说

## 教授购房经启发了人们什么



◎章剑锋  
厦门大学不动产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香港财经文摘杂志高级记者  
专栏作者

到上海出差,遇见两位目的地一致的旅伴。一位中国人,上海某大学教授;另一位日本人,东京一所日语学校的老师。

日本老师说,在东京买房子不便宜,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后,房地产正在复苏,物业销售价格也从低谷在向上反弹。虽然这样,年轻人都可以买房子,当然需要向银行借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变得不再富有或面临重大的债务压力。因为他们的收入都都很高,通常只需要花5至10年时间就可以将欠下的钱偿还完毕。

中国现在也有不同年限的按揭贷款种类,其中不乏长达20年以上的。这是为那些收入极低甚至可能是处于保障水平线上的人设置的。虽然还贷年限迥异,但大多数中国人通常需要用超过15年的时间来偿还购买一套房子所欠的债务。也就是说,中国人普遍被高房价和债务困扰,购房甚至成为大多数中低收入者趋向贫困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和社会隐患。

谈话至此,一旁的上海教授插话说,你们不能以收入来衡量中国人的购房问题,那会得出错误结论。

他有四套,这四套高级教员目前在上海拥有四套面积大致相当的房子(均超过100平米),而且都分布在比较中心的区位。买第一套房子时,虽然房价没有现在这样高,但就他个人收入水平而言,也绝不可能一次性支付。他的办法是,将积攒的全部资金(包括亲友借款)投入首付,然后再向银行申请贷款按揭。

他买入第一套房屋后,便挂牌出租,用每月收回的租金抵付银行月供,收支对抵,完全不必动用薪金,也不影响家庭日常开支。此后,他又如法炮制地买进了一套商舖和两套住宅。现在,他不仅是一位每年都可以向政府申报科研项目经费的大学教授,还是一位市场投资家或商人,每月都有不菲的租金收益。

教授想通过他的事例启发我们,因为按揭贷款,在中国购房并非难事。购房负担并不重,或者本来可以避免,甚至购房可以成为一种投资乐趣。他认为我们过分放大了国人收入与房价之间的差距。如果简单地以一个人的月收入与房地产价格作比较,唯一结论会是大多数人不可能自给自足地买进一套完整的房子,但市场现实是,很多收入与房价远不对称的人却实现了购房,教授本人即是。

确实,能否有效而灵活地配置资金已经成为人们更好地绕过高房价

收入比这一普遍困扰的一门路径,也是中国购房人必须尝试和练习的一项理财技巧。不过,很多人可能都不具备资金运作天赋,更多人在买房方面不具有冒险性,虽然他们同样都会通过银行借贷,但这只是一种必要又无奈的程序。结果,他们当然与那位教授大不相同,选择老老实实地省吃俭用以偿还银行月供和利息,希望尽快将债务清偿,然后安心地住进属于自己的房子里,终老一生。

我曾试图搜寻导致这种普遍现象的原因,目前能给出的解释是:作为一件必要的消费,多数人都会量力而为,购买住房这件生活必需品(而非投资品),而不会像其它投资那样,出于资产增值等因素考虑,以一种投资的心态或方式投入和计算。如果不是因为收入过低、财富积累有限,他们甚至可以考虑不用银行按揭。

中国人的尴尬在于,他们既无东京人的高收入,又无上海教授的可用于配置的资金实力和基础。每一个用心赚钱的人,都有大致相同的目标:不是为了现在还贷,就是为了将来还贷。欠债原本就不是一件使人感到体面和愉悦的事,遵循生而为人必须要有一套房这一基本准则,人们努力工作尚不能免除欠债,这就不是资金运作能力欠佳了,而是收入比严重不合理或房价严重偏高所致。人们更多时候的焦虑正在于此。

上海教授过多地向我们展示自己的大胆和勇气,殊不知正因为他们的存在,无端助长了房价收入比过高的矛盾。他购入的房子既非用于自住,则必然用来获利,手中的房子越多,利润空间就越大,这种增大的利润空间又是由高房价支撑,房价越高,利润越丰厚。结果,将是住房分配的空间被不断压缩,不公平消费加剧。

如果把平均一人一套房子看作一种标准分配,一人拥有三套房子,就意味着这种拥有类似于掠夺,因为那是基于另外两个社会主体的持有机会丧失而确立的。这时,如果供需结构不再平衡,价格向上波动,大多数人的平均薪水收入与房地产价格之比就会越来越离谱。

■彼岸

## 拥抱贸易赤字 享受增长果实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  
专栏作者,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如果让我选2006年最有阅读价值经济类评论文章,完全可以选择经济学家David Malpass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拥抱赤字”(Embrace the Deficit)一文。因为它解答了我的一个大疑问。

为什么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如此巨大,可美国经济却在健康的增长,华尔街的股票指数连创纪录? Malpass在文章开头便道:“过去的几十年来,美国商界、媒体的许多人以贸易赤字作为理由预言美国的经济迅速的衰落,可是现实却正好相反,贸易赤字以及资本的内流对应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并非表现出现弱,却正好显示出年轻以及快速增长的美国经济VS衰老以及缓慢增长的经济以外的经济。”

Malpass接着列举了一系列经济统计数据来说明贸易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自2001年以来,美国共增加了900万个就业机会,日本只增加了36万个,除西班牙以外的欧盟只增加了110万个,西班牙增长了360万个,英国增加了130万个,西班牙和英国一样都有不小的贸易赤字。

Malpass指出,近些年来,美国贸易赤字激增反映出如今在发达国家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今后的50年内,美国60岁以下的人口将持续增长,而日本和欧洲60岁以下的人口数已经开始下降,中国在10年后也将下降。

毫无疑问,年轻的经济体需要引入更多的资本,而年长的经济体需要购入更多的债券。年长的投资者需要有稳定收入的投资,而利率更高的美国债券就更具有吸引力,美国政府的债券利率是4.6%,而日本的政府债券只有1.9%的回报,如果投资美国的共同基金,则会有更高的回报,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外国资本流向美国。从美国一边来看,年轻的人口需要更多的资本和借债,去支付教育经费,去购置房产,去开始自己的创业,这些就造成对

资金的巨大的需求。因此,一边老年人不敢花钱,另一边年轻人需要钱,无形之中就有了这跨界的借贷组合。

当然,美国的贸易赤字与巨额借债并非是中国俗语中的“债多不愁”以及“钱借多了就有了底气”,因为资本以及借款向美国的流入完全是市场行为,并非有什么政府干预,这些资本和借款可以随时离开美国,就如一些人担心如果资金大量离开美国或市场上大量抛售美元时怎么办,美国资不抵债,整个美国经济体都会垮掉,这些担心完全忘了一个事实,美国经济给了外国资本和借款更高的回报率,因此资金没有别的地方去,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的许多外交政策招致许多国家的反对,但外国投资者仍然钟爱美国投资市场的原因,资金的回报是讲数字的,并非是情绪上的对敌。

赤字刺激增长,整体经济如此,具体的公司也是这样,处于发展阶段的公司都是在引入资本和借债,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人力、对外大做广告。过去几年,美国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公司的投资大量来自国外,虽然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单一行业来看,由于本世纪初泡沫的破灭,不一定有多大的回报,但由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突破,大大增加了美国的生产效率,从而在整体经济上有了更大的回报,因此,外国投资者如果有比较平衡的投资组合,就会有不错的投资回报。

总之,如果有一天美国的经济垮掉,不会是因为赤字,而是因为美国失去了好的经济制度,创新的能力,高的投资回报,以及年轻的人口结构。

■一人的宇宙

## 职场录用标准永远难琢磨

孤身一人置身于宇宙之中,无依无凭,何等凄惶,所以从古至今,寻求同类,彼此接纳,几乎是一切人的自然选择。正因如此,千百年来人类相互结合的无穷事例中,相似的情形不胜枚举。今天的商场、职场,也正是这无尽故事中最近的一环。现代人站在这一环上回头看去,有时见到繁星,有时见到镜鉴,这些究竟有什么用途?或许是能借助来确定一下自身的位置与姿态吧。



◎朱震宇  
专栏作者,现居北京

见宾客,参与议论。更为要紧的是,这个时代的用人职权,不仅仅在朝堂,三公等大臣也都有着独立的征辟权力。所谓征辟,也就是大臣一旦了解到某人的名声,士人入仕的最便捷方法。

这么说,简历浮夸的毕业生,也是因为老老实实在职于艰难才出此下策?或者是因为职场更偏爱较有名气的新人?如果言尽于此,恐怕都不是好结论。今日的职场中,和汉代故事更能相互印证的情形,应该是这样两点:客观、稳定的新人录用标准近乎不存在,而时代偶像越来越趋向于少年成名,哪怕多数雇主并不属于这一类。

客观、稳定的新人录用标准是什么样?是汉代的经义考试,还是网上流传的IT大公司笔试题?无论是求职的毕业生,还是负责招聘的普通职员、公司高层,他们内心的成见可能都要比客观更坚固不移。正因如此,一些企业把笔试面试的次数增加到了超乎想象的程度,无非是为了让成见相互抵消,不过在求职新人的心里,这更像是把人事交给了天命。

而另一方面,媒体主动也好,被动也好,为新人树立的偶像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为,从上世纪80后到85后,终于有了篇首所谈的灌水履历事件。除此之外,还有谁对寻求机会的年轻人具有号召力?或许太费心思而不与考虑。

这是现象,原因是什么?我妄加揣测,是在大学里的年轻人和这商业时代的主流之间,仍然有着巨大的隔阂。丰富多彩的行业、日新月异的商业模式,具体细微的实务流程,乃至基本的商业原理,对大多数学生而言,都是在一片巨大墙壁之外,透过若干细孔折射进来,不免扭曲变形。而千万人在大学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对社会中各个行业的雇主而言,又熟悉,又陌生,关于他们的行为准则、技能状况,除了简历上简略的描述,可能就只剩下刻板的印象。

放在过去,这大概可以叫做“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万象

## “欧洲病夫”重挺腰杆——英伦手记之八

英国人对“撒切尔主义”褒贬不一。有人说,她带领英国经历了必要的结构性转型,多少次他能力排众议,闯过难关;多少次美好的设想付诸东流,但他依然不厌其烦,苦口婆心。

英国的国家福利从摇篮到坟墓几乎覆盖。“大锅饭”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和贫富差距,同时也陷入公共支出庞大、纳税人负担高涨、过分依赖政府、服务质量低劣的“福利陷阱”。记得当我被SURREY那政府的成人教育中心聘用时,面对无数的表格和繁琐的程序都有微词,中心主任安慰我说,此后,我们通常不会解雇人。听罢心中暗自发笑,中国式社会主义打破了铁饭碗,我在英国将之拾起。一天,报载政府批准各大学从2006年开始调整学费(每年3000英镑以上),引发了学生上街抗议。原来英国大学也是“公有制”,不论牛津、剑桥,还是一般大学,现今收费一律每人每年1175英镑(外国人除外)。害得英国许多大学无法为一流教授支付高薪,眼睁睁看着他们投向美国人怀抱。

刚到英国时,凭着一个外国住址和个人证件,我们这些外国人轻易就登记为免费医疗NHS(“国家保健服务”系统)的成员。哪知心中的窃喜不久就被担忧代替。公费医疗中心人满为患,质量偏差。成人牙科诊所长期超额,在英国三年我都无法登记进去。即使已登记进去的普通科GP,病人经常拿不到“预约”。性急之下,只得多次自掏腰包看昂贵的私人医生。NHS属下的普通医疗中心通常只做初级诊断和治疗,较复杂的检查和专科治疗都会被推介到NHS的医院进行,其过程冗长。NHS属下非紧急手术的平均等待时间是6个月以上。为了一个简单的B超,我等了两个月。邻居一位

老人行动不便,为膝盖手术等了2年多。连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品尝了英国福利医疗的苦果。大约在2003年,他偕夫人到伦敦做私人访问。途中夫人轻微中风,被送往附近一家大医院急诊室。他们等了又等,一追再追,8,9个钟头后仍不见医生人影,工作人员爱理不理地说:“比你们还紧急的病人多的是呢”。李大夫人最后只能动用外交途径惊动英国首相府,夫人才在当天得以治疗。他无感慨地说,好在当年新加坡没有采纳福利医疗制。

其实,布莱尔也很不得将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一揽子私有化,但欲速则不达,他的初衷已遭挫折,如今采纳了渐进式的“部分引进私有机构”策略,原本在未来几年可以施行。但随着时间的引退,继任工党新首相是否会继续知难而进?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经历了“欧洲病夫”、“日落帝国”的痛楚之后,英国重新在世界舞台上挺起了腰杆。它的经济在现代欧洲各国中最为蓬勃活跃,每年增长率稳定在2.8%以上;1996年其国民收入在G7七工业大国中倒数第一,2005年大跃进至第二名,仅在美国之后;失业率也从6.8%下降到4.7%。虽然来自自相争的不同政党,却同样连任三届首相,布莱尔和撒切尔夫人在改革道路上承前启后,惺惺相惜。布莱尔感谢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对英国起了重要作用”,撒切尔夫人对保守党说,我们“不是要可以击败布莱尔的人才,而是要像布莱尔一样的人才”。



◎陈丹青  
自由撰稿人  
旅居美、英10余年